绪　论

在中国历史叙事文本中，《尚书》《春秋》仅仅处于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起步阶段，它们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左传》《战国策》《国语》处于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基本成熟阶段；《史记》处于中国历史叙事的辉煌顶峰，代表了中国历史叙事的最高成就。一部《史记》，犹如一座叙事艺术的宝藏，历代文人学者都曾不断地挖掘、开发，从汉代扬雄、班固，到唐宋的韩、柳、欧、苏，以及明清的古文家、评点家，近现代的研究家。可以说，以《史记》为对象展开叙事学的研究具有典范性的意义。

一　历代《史记》叙事研究回顾

历代对《史记》叙事的研究，各有特点，取得了不同的学术成就，这里，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两千多年的《史记》叙事研究略作回顾。

（一）汉魏六朝：起步阶段

《史记》问世后，首先得到了西汉扬雄、桓谭等人的赞许。扬雄在《法言·重黎篇》中说："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在《法言·君子篇》中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①] “实录”说为后代《史记》的叙事研究定下基调，而“爱奇”说则揭示了《史记》叙事风格形成的创作主体因素。桓谭在《新论》中说：“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②] 这就从两个方面肯定了司马迁和《史记》：一、司马迁是通才人物；二、《史记》是一部宏大的叙事著作。

东汉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记》有深入的研究，他们对《史记》叙事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总结《史记》的编纂体例，肯定其开创纪传体之功。班彪说：“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迄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又说：“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③] 第二，高度评价司马迁的史才和《史记》的叙事价值。班氏父子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④] 在古代史学评论中，“良史之才”和“实录”可以说是对史家和史书的最高褒奖。第三，称赞司马迁博学，《史记》内容广泛。班彪认为，“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播也”。班固也盛赞迁之博物洽闻，“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第四，赞赏《史记》详近略远的叙事原则。在班彪看来，“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班固也认为：“其言秦汉详矣。”第

① （汉）扬雄著，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疏义》，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413 页。

② （汉）桓谭：《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61 页。

③ （南朝）范晔：《后汉书·班彪传》，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357 页。

④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707 页。

五，叹服司马迁的文采。班彪赞扬《史记》“文质相称”，《汉书》称司马迁等人“辩知，达，溢于文辞”，“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史记》《汉书》叙事的比较，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现存最早的马、班异同论见于《晋书·张辅传》：

>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亦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①

张辅比较了《史记》《汉书》，认为《史记》在叙事上明显胜于《汉书》。主要表现在：一、《史记》叙事简练；二、《史记》叙事从大处落笔，中等琐碎事情不记；三、《史记》写人记事能够评价公允、客观公正；四、司马迁首创纪传体，难度远远大于班固的因袭模仿；五、《史记》叙事既有文采、辞藻华靡，又真实可信、详略得当，是一部优秀的史著。虽然张辅的“文字多寡论”常遭后人诟病，但他对《史记》《汉书》叙事优劣的主要判断是正确的，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南北朝时期文尚骈俪，虽然《史记》文名不彰，但是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仍涉及对《史记》叙事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刘勰确立了实录的叙事规范，充分肯定

①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40页。

了《史记》的“实录无隐”、“秉笔直书”（《文心雕龙·史传》）。二、刘勰对《史记》叙事结构有所肯定：“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辅政体，十表以谱年爵，晏殊古式，而得事序焉。”[①] 他认为，《史记》按本纪、列传、书、表分类，将政治、军事、制度、文化、外交以及人物包罗在内，容纳了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历史制度的变迁，从而建构了一个宏大有序、共时性与历时性交叉一体的富有生命感的叙事世界，所谓“得事序”；而这种用各种体裁来概括事件、人物、政治体制的结构体系又是司马迁的一种独创，所谓“殊古式”。

总之，起步阶段《史记》叙事的研究是粗浅的，特点是概括式的评语多，分析少。

（二）唐宋时期：发展阶段

唐宋时期奠定了《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唐代编纂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八部史著，全都采用纪传体，从体例上确立了《史记》“正史”之尊的地位。唐宋科举制度中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并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形成了学习《史记》的良好风气。以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为代表的唐代《史记》注释的问世，既体现了唐人对《史记》研读的深入，也对《史记》的流传和推广发挥了巨大作用。唐代中后期，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史记》的文学批评逐渐摆脱对史学批评的依附地位，走向独立。唐宋时期专门论《史记》的文章、笔记数量大增，唐代有48位文人撰写《史记》论

① （南朝）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文，宋代有69位文人撰写了381篇《史记》论文。唐宋时期《史记》叙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史学家从史学理论上、古文家从写作技法上分别对《史记》的叙事进行了初步总结。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论著，其中许多篇章都涉及叙事，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叙事的重要性，（2）历史叙事的真实性，（3）历史叙事的繁简问题，（4）史书叙述的语言和所传人物语言的不同。《史通》在这四个方面给予《史记》很多肯定，但《史通》对《史记》叙事不合情理的地方也有指责。刘知几说："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著史籍，贻误后学，不其甚邪！"① 这是说司马迁混淆了文学虚构与历史事实的区别。刘知几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批评《史记》的文学性虚构叙事，这是情理中的事。文人对《史记》的叙事技法也有总结，例如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指出《史记》的文章有"如骏马下驻千丈坡"的气势和力量，造成这种文章风格的原因是司马迁善于运用"重沓熟复"的方法。通过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造成语意的呼应，感情的回荡，增加文章的气势和力量。刘将孙在《萧达可文序》中说："太史公之鼓舞变化，类常事小节，他人以为不足传者"，点出了《史记》善于以小见大的叙事特点。苏洵首先指出《史记》叙事上使用了"互见法"：

> 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

①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四册），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48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夫颇、食其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辩如郦食其，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彰乎！①

"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这就是《史记》的互见法。这个发现，开拓了《史记》研究的新领域，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史记》的写人叙事提供了新的思路。

2.《史记》体例——叙事结构的研究成为热点。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序》、张守节在《史记正义·序》、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二体"中对于《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给予了许多肯定性的评价。尤其是皇甫湜专门写了《编年纪传体》一文，进一步细致地分析了编年、纪传二体的短长，盛赞了司马迁创立的"五体"，他认为，纪传体好处很多，可以传之不朽。

3. 对《史记》的叙事风格进行了初步的总结。韩愈提倡向《史记》学习，认为《史记》"雄深雅健"，柳宗元也推崇《史记》，称"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此后，"雄健"、"峻洁"成为《史记》美学风貌的定评。此外，苏辙提出"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此论开后世《史记》山川助文章的先河。

概言之，唐宋时期形成了史学家、文学家共同研究《史记》的新形势，尤其是古文家开创了评论《史记》的风气，使《史记》的叙事研究有了一定的拓展与深入。

---

① 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 页。

（三）明清时期：兴盛阶段

明代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为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明代刻印《史记》达二十多种，对于推动《史记》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文学复古运动的高涨，《史记》的研究价值随之提高。前后七子“文称左迁，赋尚屈宋，古诗体尚汉魏，近律则法李杜”（《续藏书·何景明传》），清代桐城派更是将《史记》抬到了古文宗主的地位，所谓“《史记》如海，无所不包，亦无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此书者”。归有光评点的《史记》在当时被奉为秘笈，这既是对归氏的崇信，也是对《史记》的膜拜。

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应试文体八股文对写作规范有更加严格的要求，促使文人更加积极于文章写作技巧的挖掘，追求文章写作方法就出现了评点。清人刘声木《萇楚斋随笔》记载：“评点始于南宋诸儒，当时选本，若宋楼昉编《崇古文诀》三十五卷，宋吕祖谦编《古文关键》二卷，宋谢枋得编《文章轨范》七卷，卷中始有评点勾抹，后世皆称善本，即《四库提要》亦言其善。后来明人踵行其法，变本加厉，几于无一书不评点……其实评点能启发人意，固有益于讲说，姚姬传郎中鼐亦尝言之，曾文正公国藩至谓之评点学。”[①] 明清两代掀起的评点高潮，将先秦两汉的散文评点殆尽，《史记》是评点率最高的一本书。明代《史记》评点家有八十多位，清代有三百多位，可见一斑。[②]

明清《史记》评点主要是就文论文，从文章写法角度评论《史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杨慎的《史记题评》、茅坤的

① （清）刘声木：《萇楚斋随笔》，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② 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史记评钞》、何焯的《读史记》、归有光、方苞的《归方评点史记合笔》、吴见思的《史记论文》、汤谐的《史记半解》、牛运震的《史记评注》、王又朴的《史记七篇读法》、李晚芳的《读史管见》、邱逢年的《史记阐要》等是影响大、成就高的评点著作。他们对《史记》叙事的评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 评点《史记》叙事的章法脉络

明清评点家普遍认为《史记》叙事章法谨严，脉络清晰。茅坤说："且太史公所擅，秦汉以来文章宗者何？唯以独得其解云耳。每读其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舆家之千里来龙，到头只求一穴。读其小论，或断言只简之文，如蜉蝣蠛蠓之生，种种形神，无所不备。读前段，便可识后段结按处，读后段，便可识前段起按处。于中欲损益一句一字处，便如于匹练中抽一缕，自难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独得其至，非后人所及。"表达的就是围绕中心、前后照应的叙事原理。对此清人惠栋说："《史记》长篇之妙，千百言如一句，由其线索在手，举重若轻也。识得此法，便目无全牛。"这里"千百言如一句"就是中心突出，线索清晰。凌稚隆评《商君列传》时说："通篇以'法'字作骨，曰'鞅欲变法'，曰'卒定变法之令'，曰'于是太子犯法'，曰'将法太子'，而终止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血脉何等贯串！"[①] 钟惺在《张丞相列传》的评点中说："以'丞相'二字作眼，却从御史大夫说来，实归重丞相，故本传不曰张苍，而曰张丞相，此命题主意也。"[②] 汤谐在《司马穰苴列传》的评点中说："文武二句，一篇纲领，诸庄贾斩使者仆是武；拊循士卒是

① 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77页。

② 同上书，第648页。

文。以是拊众，即以是威敌，而燕晋之兵不战以屈矣。行文严肃静重，亦在乃文乃武之间。”①

2. 称赞《史记》叙事手法变化多端、不拘一格

王维桢说，“迁史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续颠，或繁条而约言，或一传而数事，或从中变，或自旁入，意到笔随，思余语止，若此类不可毛举，竟不得其要领”，只是粗略指出《史记》叙事手法的变化多端；冯班指出，“《史记》叙事，如水之傅器，方圆深浅，皆自然相应”；汤谐认为，“《史记》之文，一篇自有一法，或一篇兼具数法。烟云缭绕处，几于勺水不漏，而寄托遥深，迷离变幻，使人莫可端倪。一片惨淡经营之意匠，皆藏于浑浑沦沦浩浩落落之中，所以为微密之至，而其貌反似阔疏也……”刘熙载《艺概》说，“《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②《史记》叙事手法多样，变化多端，最形象的说法要数吴见思评点《高祖本纪》中的一段话了，“高祖开创之时，事务极多，多则便难抟捖矣。看它东穿西插，纵横不乱，如绣错，如花分，突起忽往，络绎不绝，如马迹，如蛛丝。或一齐乱起，如野火，如骤雨；或一段独下，如澄波，如皓月。万余字组成一篇，非有神力，安能办此”。③ 由此可见明清评点家对《史记》叙事技法有很高的评价。

3. 将《史记》与小说相提并论在明清两代蔚然成风

李开先《词谑》记载：“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

① 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69 页。

② （清）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2 页。

③ 吴见思、李景星著，陆永品点校整理：《史记论文史记评议》，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叙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此后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小说评点家大都胸中放着一部《史记》，小说批评中随时取出作参考。明清小说评点家大致从以下三个方面将《史记》与小说作了比较：一是编撰体例方面，其中简单比附之处很多；二是叙事笔法、情节结构方面，虽有可取之处，但也不乏比附；三是涉及《史记》中存在的虚构、细节描写等小说手法。

4. 探寻司马迁写史的深意

评点家对《史记》中的重要篇章叙事的深层寓意往往能分析挖掘，其中以李晚芳的《读史管见》、王又朴的《史记七篇读法》、汤谐的《史记半解》、牛运震的《史记评注》、吴见思的《史记论文》最有见地。例如李晚芳在《屈原贾生列传》评点中说，“司马迁作《屈原传》，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盖屈原获罪被放，司马亦获罪被刑，其获罪同，而所以获罪则不同，屈原宜怨，司马不宜怨……”[①] 这些见解鞭辟入里，发人深思，可以帮助人们深入理解《史记》叙事中所寓含的深意。

总之，明清众多文人对《史记》进行了全面、细致、深入的评点，对《史记》在叙事技法、章法上的研究都超出了前人，对我们现代人学习《史记》有重要的启示。

（四）近现代：突变阶段

近现代是中国社会的剧变时期，《史记》的叙事研究也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点，研究方法、重心时时变化，有力地推进了《史

① 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15 页。

记》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从史学、文学两个方面肯定了《史记》的卓越成就。五六十年代报纸上曾展开过“《史记》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和“《史记》艺术力量的根源”问题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史记》的文学研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如：郭双成先生的《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李少雍先生的《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可永雪先生的《史记的文学成就论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张新科先生的《史记与中国文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都涉及了《史记》叙事方面的总结。再加上大量的研究论文，这一时期《史记》叙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在前代基础上继续对叙事方法进行总结。梁启超先生在《作文教学法》（《饮冰室全集》第十五卷）中首先提出了《史记·西南夷列传》运用“类概法”，《货殖列传》运用“鸟瞰法”叙事。[①] 白寿彝先生在《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中指出：《史记》“寓论断于叙事”的手法，写出了深刻动人的篇章。它不是先发一套议论，再讲事实，也不是把事情说完了，再来一个架空的分析，而是通过历史过程的叙述，引导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并认为“寓论断于叙事”是《史记》叙事最基本的形式。韩国学者朴宰雨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一书中，很好地总结了《史记》事件描写的技巧：（1）“上升法”；（2）“对称法”、“对比法”；（3）“插叙法”、“减轻法”；（4）“悬疑法”等。[②]

2. 受西方美学理论的影响展开了《史记》叙事美学的讨论。

①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作文教学法》，中华书局1916年版。

② ［韩］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360页。

对此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讽刺美和悲剧美。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第九章“文学史上的司马迁”中专门提出“司马迁之讽刺”。他从司马迁的讽刺目标和讽刺“阵法”两方面进行阐述。其中讽刺“阵法”有九则，一则用揭穿事实的方法，事实往往是最强有力的讽刺。二则用无言的讽刺，凡是他不赞成的事便不去写，读者自然可以晓得什么是在缺乏着了。三则用互见的方法，他绝不把高祖的流氓行径及小气刻写在《高祖本纪》里，却分散在《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里。四则用反言的方法，他口头在赞扬，骨子里却是讽刺。五则用轻重倒置的方法，偏把主旨放在次要。六则用指桑骂槐的方法，他不骂汉而骂秦。七则用借刀杀人的方法，用孔子抵挡封禅，用汲黯指斥武帝。八则全然在语气里带出来，他用几个“矣”字，往往就把他的意思传达出来了。九则常用无理由为理由。[①] 宋嗣廉先生在《史记的艺术美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专设一章“《史记》讽刺艺术美”，从《史记》讽刺艺术遵循的原则、《史记》讽刺艺术的形式、《史记》讽刺艺术手法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此外李世萼先生于 1982 年在《杭州师院学报》第 1 期上发表了《谈太史公讽刺之“奇”——〈史记〉的讽刺艺术之一》，萧涤非先生在 1985 年第 1—2 期《泰安师专学报》上发表了《略论司马迁的讽刺手法》等文。20 世纪 80 年代，学术界才展开对《史记》悲剧性的研究，由韩兆琦先生首先提出了“《史记》——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的看法，[②] 此外，韩先生在《史记通论》中论述了“《史记》的悲剧性”，又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中论及了“《史

①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324—325 页。

② 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8—117 页。

记》的悲剧色彩”，张新科先生在《〈史记〉与中国文学》中专论了《史记》的悲剧范畴与类型、《史记》的悲剧精神与悲剧效果、《史记》的悲剧艺术与结构特征、司马迁的悲剧心态与悲剧时代。[①] 近二十年间关于《史记》悲剧性方面的论文也有二十余篇，掀起了《史记》美学研究的一个新热潮。

两千多年来，《史记》叙事研究经历了由粗浅走向深入的过程，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讲也在不断地拓展。这些学术成果是我们当代学人阅读、理解、研究《史记》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很好地接受与继承！

二　本书研究的方法及意义

本书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利用西方叙事学展开对《史记》全新的解读与研究。

（一）基本概念及理论

叙事学（narratology），国内译为“叙事学”或“叙述学”。申丹先生对两种翻译有以下认识，两种译法并非完全同义。“叙述”一词与“叙述者”紧密相连，宜指话语层次上的叙述技巧，而“叙事”一词则更适合涵盖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这两个层面。在《叙事学辞典》中，普林斯（G. Prince）将“narratology”定义为：1. 受结构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有关叙事作品的理论，narratology 研究不同媒介的叙事作品的性质、形式和运作规律，以及叙事作品的生产者和接受者的叙事能力。探讨的层次包括“故

① 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2—143 页。

事”与“叙述”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2. 将叙事作品作为对故事事件的文字表达来研究（以热奈特为代表）。在这一有限的意义上，narratology 无视故事本身，而聚焦于叙述话语。不难看出，第一个定义中的“narratology”应译为“叙事学”，即有关整个叙事作品的理论，而第二个定义中的“narratology”则应译为“叙述学”，即有关叙述话语的理论。[①] 笔者以为第一个定义的翻译是准确的，而第二个定义用“叙事研究”来表述更方便。本书题目中的“叙事学”正是对《叙事学辞典》中第一定义理解的前提下确定的。

叙事学（narratology）首先由法国学者茨·托多洛夫（T. Todorov）在 1969 年他的《〈十日谈〉语法》一文中提出，到现在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是当今西方发展迅速、异常活跃的文艺理论之一，其影响力巨大，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分支。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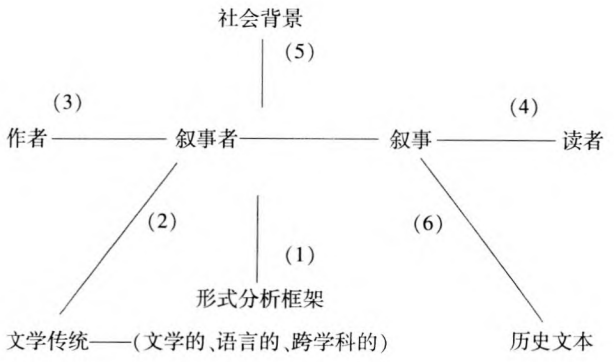


图 1

① 申丹：《叙事学》，《外国文学》2003 年第 3 期，第 60—65 页。

早期法国结构主义者着重于轴（1），社会学者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讨论轴（5），视点批评以轴（3）的研究为主，读者反应批评为轴（4）所代表，俄国形式主义者注重研究的是三角形（2）。叙事学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已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理论。戴维·赫尔曼说，“在互相渗透的年代里，单一的叙事学实际上已经分支为多种叙事学，结构主义关于故事的理论构建发展成为叙事分析中的多重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单一的叙事学出现了诸如电影叙事学、音乐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网络叙事学、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有时也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笔者以为上图中三角形（6）正表明了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或新历史主义）研究的主要问题。

新历史主义学者接受了卡西尔的“符号论”观念，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都要借助于语言再现过去（文学作品也写将来），都要借助于想象形成虚构成分，以弥补事实的不足。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在《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描写过去事情的方式，历史主要是由一些文本和一种阅读、诠释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①] 怀特认为，“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它们与科学领域的叙述不同”；“历史，无论是描写一个环境，分析一个历史进程，还是讲一个故事，它都是一种话语形式，都具有叙事性”。作为叙事，历史使用了“想象”话语中常见的结构和过程，只不过它讲述的是“真实事件”，而不是想象的、发明的事件或建构的事件，这意味着历史与神话、史诗、罗曼司、悲剧、喜剧等虚构形式采取了完全相同

①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57页。

的形式结构。“历史叙事不仅是关于事件和过程的模式，也是形而上学的陈述，这种说明昔日事件和过程的陈述同我们解释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意义所使用的故事类型是相似的。”① 他借用形式主义观点指出，一个历史叙事不仅是它所报道的事件的再生产，也是象征符号的错综，这种象征符号的错综指引我们找到我们文学传统中关于事件结构的图标。这些观点成为本书确立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叙事学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叙事学”同其他许多理论一样登陆中国。西方叙事学的有关论著在这个时期被大量翻译过来，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华莱士·马丁的《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荷兰学者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9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开始研究叙事学，现代文论、古典文论、外国文论三支队伍中都有一批人潜心于叙事学研究，不断有引人注目的论文与著作问世。其中着意于理论构架的有徐岱的《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傅修延的《讲故事的奥秘》（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罗钢的《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胡亚敏的《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申丹的《叙事学与小说文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① ［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6—380页。

版）；受美国学者丁乃通的《中西叙事学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等论著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的叙事文本，其中成就大、影响广泛的有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中国小说史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①

笔者以为在运用叙事学剖析作品时，学者们大都局限在小说这一文本上，对其他叙事性文本涉及不够，尤其是对中国历史叙事文本讨论不够。目前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是美籍学者王靖宇的《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而此书中所收的 11 篇论文，有 7 篇是专门研究《左传》的叙事艺术的，而代表中国历史叙事最高成就的《史记》仅有一篇论及，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当然，从 1989 年《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增刊上发表了王增恂的《〈史记〉叙事问题和时空问题——从西方叙事学理论看〈史记〉的文学价值》以来，陆续有学人撰文，尝试运用叙事学中的一些概念分析《史记》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如张宏军的《〈史记〉叙事法中的虚拟性特征》，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纪丽真的《特异性追求：〈史记〉叙事策略》，见《齐鲁学刊》2003 年第 4 期；高萍的《〈史记〉人物传记叙事时间模式研究》，见《社会科学研究》2002 年第 6 期；唐子恒的《〈史记〉叙事的矛盾与夸张》，见《晋阳学刊》2002 年第 4 期；陈曦的《〈史记〉隐含叙述探索》，见《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刘卫华的《〈史记〉中的预叙及其叙事效果》，

① 金健人：《叙事研究的轨迹与重心转移》，《浙江大学学报》2001 年第 9 期，第 5—13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